

学贵力行:孔子思想的可贵品质

□ 陈 力

孔子是中国伟大的教育家、思想家、政治家，古人尊孔子为“圣人”“至圣先师”等。孔子不仅具有渊博的知识和高尚的情操，还有学贵力行、躬行践履的精神，他以勤奋学习、勤勉修身、改造社会为己任，在社会实践中不断丰富知识、增长才干，创立了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。

“学而时习之” 学习与实践相结合

《论语》开篇第一句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他期望自己的学术、学说能够用世，指导当时的社会实践。如果自己的信念能够变成现实，那一定是特别令人喜悦的事情。《论语》编者把这句话作为全书的开篇，可见孔子积极用世的态度。孔子说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”“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”。也同样显示了孔子躬行实践的精神。

孔子认为，实践本身就是学习的组成部分。“子以四教：文、行、忠、信。”“文”指历代文献知识，“行”指社会生活实践，“忠”指与人交往的忠心，“信”指言而有信。孔子以“行”作为教学内容之一，是为了解决知识与实践的结合问题。“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”，这是孔子治学的方法，是他治学的五个步骤。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，都是为了“笃行”。一个人如果只学习书本知识，却不能把书本知识转化为实际工作能力，那是死读书、读死书。孔子说：“诵《诗》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达；使于四方，不能专对；虽多，亦奚以为？”熟读《诗经》三百篇，交给他具体事务，却不能很好地完成，让他出使各国，却不能独立应对，纵使读书再多，又有什么用呢？

孔子施教，在于成人之德。孔子的成德之教就是为了造就为政治国的人才。例如，孔子向季康子介绍仲由、子贡、冉求三位得意门生。孔子认为他们三人各有所长，可以为官。孔子说：“由也果，于从政乎何有？”“赐也达，于从政乎何有？”“求也艺，于从政乎何有？”在孔子那里，读书当然不是为了成为徒有知识的“两脚书橱”，而是要应用到实际，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。孔子教弟子学诗，因为诗“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。孔子说：“不学诗，无以言”“不学礼，无以立。”他重视学习诗与礼等知识，着眼点在于“事父”“事君”“以言”“以立”。

“修己安人” 修身要落实到行动上

孔子把君子作为做人的标杆。子路

请教老师如何才能做君子。孔子告诉他，“修己以敬”“修己以安人”“修己以安百姓”，修己以使自己“敬”，能“安人”“安百姓”，这自然是“修己”的目的所在，孔子“修己安人”，恰是他“内圣外王”理论学说的核心，内心朝着圣人的标准修炼，目的在于是就一番社会功业。“修己”“内圣”是途径、是方法，“安人”“外王”才是目标、是期许。

“仁”是孔子思想的核心，是孔子提出的最高道德标准。如何才能做到仁？孔子说：“力行近乎仁。”努力做事情，把事情做好，才能一步一步接近仁。在《论语》中“仁”出现了109次，从中我们可以观察孔子“仁”的思想。在孔子的诸多解释中，他往往不讲空洞的道理，他即事言理，他的论述都有具体行为指向，落实到如何做。比如颜渊问仁，孔子告诉他：“克己复礼为仁。”“克己复礼”是自觉行动，然后孔子再告诉他具体做法：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”仲弓有治国之才，孔子特别欣赏他，尤其注重其仁德的培养。所以，仲弓问仁，孔子告诉他：“出门如见大宾，使民如承大祭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在邦无怨，在家无怨。”在孔子看来，仁德的养成要落实在具体事情当中，体现在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孔子弟子子张也问仁于孔子。孔子告诉他，做到“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”，就算做到了仁。这五条中，“敏”和“惠”着重在事功，意思是勤敏做事，为百姓多做事，做实事，这样就可以博施济众、造福百姓。

孔子曾经整理六经，删《诗》《书》、定《礼》《乐》、作《春秋》、赞《周易》，因为六经各有特征，对于治国具有实际的效用。孔子说：“入其国，其教可知也。其为人也温柔敦厚，《诗》教也；疏通知远，《书》教也；广博易良，《乐》教也；洁静精微，《易》教也；恭俭庄敬，《礼》教也；属辞比事，《春秋》教也。”可以看出，孔子整理古代典籍，恰是为了人心的和顺与顺畅，为了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的社会风尚。他整理六经，正是为了借助“先王正典”和历史事实以明王道。例如，他作《春秋》，用他本人的话，就是“载之空言，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”。

“讷于言而敏于行” 崇尚实干，反对空谈

孔子重实干，戒空谈。孔子指出：“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。”君子把说得多做少视为耻辱。孔子认为应该“先行其言，而后从之”，说过的话必须要落实、要落地，最好多做事少说话，“欲讷于言而敏于行”“敏于事而慎于言”。

冉有性格优柔寡断，他问孔子：“闻斯行诸？”冉有的疑惑是：听到该做

的事情就要马上去做吗？还要不要再考虑考虑后果？孔子直截了当地告诉他：“闻斯行之！”意思是，听到后就要马上去做，不必犹豫。季文子三思而后行，孔子听说后，说：“再，斯可矣。”在这里，孔子的意思是人心中有了是非感，有了正确的目标，有了正确的价值观，很多事情其实并没那么复杂，犹犹豫豫、瞻前顾后、缺乏果断，不能刚直，不能切实地踏实行动并不可取。子路请教老师如何为政，孔子说“先之劳之”，还要“无倦”，把事情做在百姓之前，而且还要废寝忘食，夜以继日，不知疲倦。

《论语》两次记载孔子说：“巧言令色，鲜矣仁。”孔子认为“巧言乱德”，认为一个人花言巧语，面目伪善，这类人的仁德一定是很少的。孔子由于无法实现政治理想而抒发感叹说“子欲无言”。子贡说：“子如不言，则小子何述焉？”孔子说：“天何言哉？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？”在孔子看来，天又何尝说了什么，一年四季照常运行，天下百物照常生长。孔子想效法于天，做而不言，这也许是人生最高的境界。

“人能弘道” 学贵力行，弘道求仁

孔子是实干家，什么事情都能够做得很好。他年轻时做过“委吏”，“会计当而已矣”，把账目记得清清楚楚；做“乘田”，“牛羊茁壮长”，把牛羊养得膘肥体壮。

孔子普惠众生，创办私学，因材施教，“弟子三千，贤者七十二”，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，是成功的教育家；他“学而优则仕”，出仕为官，50岁时做中都宰，“一年，四方皆则之”。孔子为鲁国大司寇，为政十分出色，“齐人闻而惧”。可见，孔子是政绩卓越的政治家。

孔子整理六经，为中国文化赍续文脉，是伟大的古文献学家；他周游列国14年，矢志践行自己的政治理想，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，他历经磨难，“再逐于鲁，削迹于卫，伐树于宋，穷于商周，围于陈蔡”“累累若丧家之狗”，但他初心不改，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。

孔子的一生，正如他自己所言：“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，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。”他学贵力行，无时无刻不在弘道求仁，躬行践履，成为躬行实践的典范。



扶危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以帮助他人之乐、以解人之难为荣，扶危济困思想彰显的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操，它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中。

历史脉络

扶危济困传统美德在中华民族的精神长河中源远流长。早在商周时期，华夏儿女就萌发出关爱救济穷苦的思想。《尚书》中提出“德惟善政，政在养民”“不虐无告，不废困穷”，认为执政者要积极推行善政，使百姓生活越来越好，并及时周济处于困苦中的群众。“鸿雁于飞，肃肃其羽。之子于征，劬劳于野。爰及矜人，哀此鳏寡”，这是《诗经》中一首名为《鸿雁》的诗，文词优美又寓意深刻，体现了对弱者的怜悯和同情。

到了春秋战国时期，扶危济困思想有了大的飞跃。孔子提出了仁爱的思想，鼓励人们要广泛地爱护周围的大众，及时帮助处于困难的人。他说：“泛爱众而亲仁”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。墨子则主张兼相爱，提倡人们应该像爱护自己亲人一样爱护别人，又提出人应该互帮互助、周急济贫。他号召“有力者疾以助人，有财者勉以分人，有道者劝以教人”，让“饥者得食，寒者得衣”。

在多方面思想资源的滋养下，扶危济困逐步深入到中华民族精神的骨髓里，成为中华民族的信仰。这在汉语的词汇中就可见一斑，诸如“仗义疏财”“慷慨解囊”“周急济贫”“济弱扶倾”“轻财重义”“见义勇为”等等成语不胜枚举。民间谚语也有很多，比如“与其锦上添花，不如雪中送炭”“求人须求大丈夫，济人须济急时无”。这些成语和谚语口口相传、代代相继，扶危济困的精神也随之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中不断流淌。

文化内涵

一是济人危难。人在生活中难免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，其中有些困难单靠个人的努力无法克服，这就需要得到其他人的帮助。在面对困难的时刻，他人伸出援助之手，哪怕只是一点一滴，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《增广贤文》中说：“渴时一滴如甘露，醉后添杯不如无。”面对困难之时，人们特别渴望特别需要他人的帮助，此时帮助的到来可以说是恰逢其时。因此，善良的人们都是对处于困难的他人加以特别的关怀，这些人或者是在社会中有困难的群体，诸如鳏寡孤独，或者是一时遭受天灾或疾病，生活面对严重困难的人。积极帮助他们摆脱困境，体现出一个人的高尚情操和美好人格。

二是助人为乐。优秀传统文化认为，帮助处于困境的人是一

种人生的快乐。明代吕近溪说：“世间第一好事，莫如救难怜贫。”这种由助人得到的快乐，是精神上的愉悦感、灵魂上的幸福感、内心上的富有感。无论是儒家的“泛爱众”，还是墨家的“兼相爱”，都认为应积极去关爱他人，急人之急，帮人之忧，救人之危。这种洋溢着与人为善的优秀品格，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灵中，培育了无数仁爱之士。从刘备“勿以善小而不为”，到杜甫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，再到郑板桥“衙斋卧听萧萧竹，疑是民间疾苦声”。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，都心系百姓，为改善百姓生活、改变弱者处境，而不懈努力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中华民族文明史，就是一部扶危济困的美德流传史。

三是团结互助。扶危济困思想，在传统社会中另一种表现是团结互助。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可能遇到困难，既帮助他人也需要他人帮助。这体现了一种团结互助的精神。人类之所以能够不断战胜自然灾害，战胜事故灾难，靠的就是这种精神。中国古代哲人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。战国时期孟子就指出，居住在同一地方的人们，不仅平时要相互友善，还要在困难时期相互帮助，“出入相友，守望相助，疾病相扶持”。《管子》则提出“死丧相恤，祸福相忧”，认为人们在困苦时精神上的相互慰藉也非常重要。这种面对困难时团结合作的思想，体现出强烈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。古代民间社会的邻里团结、互助和睦、助人为乐的文化，正是在这种意识的影响下逐步形成的。

价值底蕴

一是人性本善的道德观念。要帮助处于危难困苦中的人们，是出自外在的义务和责任，还是发自内心的情感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为，应该是后者。孟子指出，人人都有怜悯体恤他人的心，“人皆有不忍人之心”。他举例说，看到小孩将要掉进井里，人们在那一瞬间都会不假思索生出侧隐之心。由此可见，这种侧隐之心是人心灵深处固有的善念，而不是来自于外界的约定。这种侧隐之心，是一种对他人的困难感同身受的同情心，是一种愿意采取行动去减轻这种痛苦不幸的怜悯心。正是因为这种同情心、怜悯心的存在，人们才愿意采取行动去雪中送炭、济困解危。

二是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价值观念。中国传统文化高扬对人的生命的尊重，肯定人的生命权和生存权，这为扶危济困思想提供了价值依据。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认为天地中间人最为宝贵。因为人最宝贵，所以人的生命权生存权需要得到保障。高度关注最需要保障生命权生存权的群体，例如鳏寡孤独、老弱病残。作为政府的行为，这就是善政养民；作为个人的行为，这就是

□ 孙庆峰

扶危济困美德的历史根脉

行善积德。

三是天下为公的共享观念。中国传统文化认为，天地是人类所共有的天地，天地之间的有限资源也应该为人们所共有。扶危济困思想体现的就是这种公平和共享的理念，它鼓励财富在人们之间流动，由富人流向穷人，不至于让社会中有的人极端富裕，有的人极端贫困。《道德经》中说：“天之道，其犹张弓欤！高者抑之，下者举之，有余者损之，不足者补之，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。”作为富人要顺天之道而行事，就不应该只关注自己的生活，只将财富留给亲人，而是应该多去关心关怀困难之人，给予他们一定的物质帮助和精神鼓励，帮助他们渡过难关。

东林党的大员逐渐被扫除干净，朝中能制衡魏忠贤一党的力量已经不多，袁可立挺身而出，与魏忠贤一党“数有所抵牾”，当时朝野赞颂甚而主张为魏忠贤建生祠者多不胜数，后来崇祯帝查办魏忠贤，查实的主张为魏忠贤建生祠的大小臣工数以千计，唯独袁可立没有参与。大学士黄道周感叹道：“当魏崔时，盖无复然明义、真者。有之，则必自大司马节寰袁公也。”

南京户部尚书正好空缺，廷议推举袁可立，但是魏忠贤一党已经无法再容忍袁可立，“传票致仕”，袁可立当堂抗疏道：“此非挂冠神武门时乎？”遂归故里。

崇祯六年（1633年），袁可立病逝于睢州，崇祯帝亲派使者祭葬，内阁首辅孔贞运亲自撰写墓志铭：“使天假数年，则公（袁可立）将奋谋决策，焚冒顿之虎落，犁老上之龙庭，以抒我皇上东顾之忧。”入睢州乡贤祠。

无论是作为地方的推官、巡抚，还是作为身居庙堂的大臣，袁可立一生为国为民，诚如名士陈继儒所言“生死无暇，荣哀兼备，盖先朝之宝臣，而亦后来学士大夫出处之榜样也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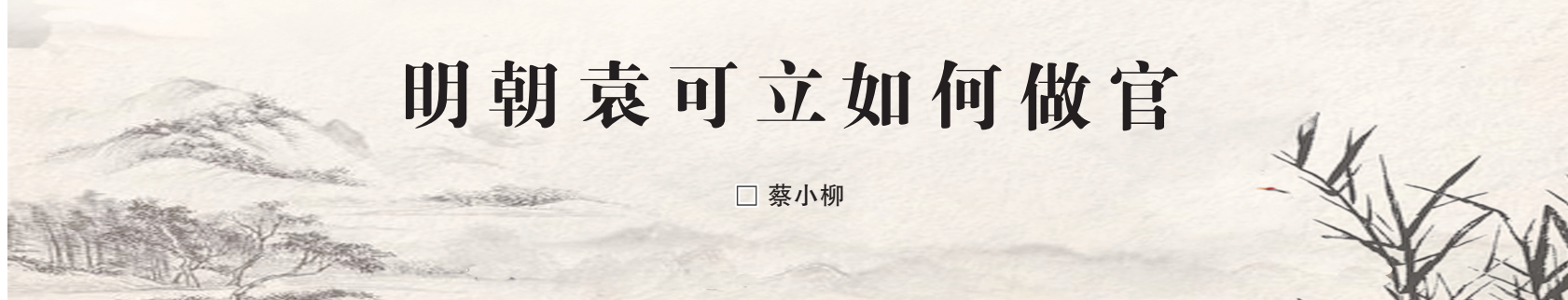
袁可立（1562—1633年），字礼卿，别号节寰，睢州（今河南省睢县）人，历经明万历、泰昌、天启、崇祯四朝，曾任苏州府推官、登莱巡抚、兵部左侍郎等职。他刚直不阿，允文允武，博雅多能，天启帝称赞他“精神折冲于千里，文武为宪于万邦”。

（一）

万历十七年（1589年）袁可立进士及第，出任苏州府推官，明代各府设推官一名，正七品，掌理刑名、赞计粮。明代的苏州府富庶甲于天下，为国家重地，权贵豪强众多，最为难治，刑狱之事比其他地方更为复杂繁多，“胥吏抱牍如山，公（袁可立）片言立决，如风扫摧，爰书无只字出入”。

当时日本掌权者丰臣秀吉侵略朝鲜，倭寇出没于海上，苏州一带沿海戒严，吴中富家子弟王士驤、乔一琦等招募乡民御倭保家，时常操练，十分招摇。有仇家举报他们意图谋反，要知道在古代，谋反可是灭九族的大罪，“抚按为之色变”。这样的事别人碰到躲都来不及，然而袁可立“深明其不然”，以自己的身家性命来担保他们没有谋反，“四部会臧，卒无事”。

袁可立曾经巡查海上的兵饷，一个武将将要赠送给他三把倭刀，被他拒绝了，但是袁可立心里明白这是琉球的东西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海上军报抓获“倭寇”20人，缴获器物若干。巡



明朝袁可立如何做官

□ 蔡小柳

抚令袁可立查验，发现所缴获的器物里有先前见过的三把倭刀。袁可立心中起疑，将“倭寇”暂时关到吴县监禁进行调查。不久，琉球的贡使到来，才弄清楚那些所谓的“倭寇”是琉球的良民，因为运粮在海上遇到风浪，却被当成倭寇，袁可立把他们都释放了。为感谢袁可立的救命之恩，琉球为袁可立建庙敬供。

时任苏州知府石昆玉清廉正直，治理苏州很有政绩，但是却因为不会讨好权贵得罪了巡抚李淦，李淦借故弹劾，将石昆玉下狱查问，其他的官员都害怕得罪巡抚，不敢为石昆玉申冤。唯有袁可立说：“吾不能以真是非佐上官喜怒，有独任怨耳。”为石昆玉申冤，查明了案情，洗刷了不白之冤。巡抚李淦因此羞愧引劾去职，袁可立也因此声名远扬，不单是苏州本地，就是其他地方有疑难事情也来请他裁断。

推官只不过区区七品，是州府的佐贰官，并不是主官，但袁可立后来

却以苏州府推官身份被祀于苏州名宦祠，与文天祥、海瑞、于成龙、林则徐等并列，是明清两代500多年里所有苏州府推官中唯一入苏州名宦祠的。

万历二十二年（1594年），袁可立以政绩第一受到万历皇帝亲自召见，升任山西道监察御史。

（二）

天启元年（1621年），后金的威胁日益严重，天启帝日夜忧虑边事，袁可立上平辽七条方略，“上悉嘉纳允行之”。天启二年（1622年），天启帝“谓弹压登莱非公（袁可立）不可，于是以节钺授公”，加袁可立右金都御史“巡抚登莱等处地方备兵防海费理征东军务”。

后金当时已经占领整个辽东半岛，对明朝的威胁越来越大。登莱地区已成为前沿阵地，袁可立严肃军纪，建设水师，积有战船4000余艘，使登莱军力大大增强，确保了明朝沿

海疆域的安全，而且大大牵制削弱了后金陆路对山海关一线的压力。袁可立积极掌控制海权，屯兵各岛间，于战略要地皇城岛设参将、守备各一员，练兵三千，又设南游、北游两营，分区设防，往来巡逻于海上，“时东时西，忽远忽近，使敌望之不知所攻，亦不知所守，因劳为逸，反客为主，（后金的）布帆草筏于是绝迹”。

袁可立对后金并不是一味防守，他积极进取步步为营向前推进，大力支持毛文龙开创东江镇，招抚安置大量辽东流民，不断袭扰后金腹地，消灭后金有生力量，日益成为后金心腹大患。天启三年（1623年），袁可立令登莱、东江两镇兵马出击后金，沈有容“自皇城岛掩袭旅顺南四卫”，毛文龙“自皮岛掩袭镇江九连城”。大将张盘率军一举攻下金州，乘胜收复旅顺等地。金州、复州等地的收复，开辟了辽东战场的新局面。

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袁可立还策反了努尔哈赤以姻娅待之的刘爱塔，

这也是明与后金战争史上明朝降虏后金级别最高的将领。更重要的是，刘爱塔反归明造成了后金汉官降将瓦解殆尽。

难能可贵的是，袁可立卸任登莱巡抚时，“及归之日，角巾野服，口不言功”。然而公道自在人心，在登州名宦祠中，整个明朝登莱十四任巡抚里，袁可立是唯一被列入的，也是公认的最有政绩、最有作为的一任巡抚。

（三）

天启五年（1625年），天启帝传谕兵部：“方今边疆多事，择将须用谋勇兼全的好人”，“思帷幄臣”，召袁可立回朝“入赞戎枢”，先为兵部右侍郎，再改兵部左侍郎。天启年间，魏忠贤专权，朝中党派纷争。袁可立本身并无党附，只是一心为国为民，但他与东林党高攀龙、冯从吾为同年，魏忠贤一党对他多有忌惮。

魏忠贤一党逐渐掌握朝政大权，